

建设方志文化的思考

汪毅

2011-11-25 15:34:10

汪毅

内容提要: 方志文化属于中华文化范畴,是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方志文化建设是时代要求、表现要求、传播要求、参与要求所决定的。方志文化具有特色,其建设应置之于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去思考。

关键词: 方志文化 方志文化建设 思考

作者简介: 汪毅,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策法规宣传处处长、四川省地方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志》副总编、《巴蜀史志》副主编。

文化的定义林林总总,特别是在泛文化的今天。自然,由此衍生的方志文化定义亦是五彩缤纷。而本文表述的方志文化,则是从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角度来解读的,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均简称“《条例》”)所规定的角度进行解读的。《条例》制定的前提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点实在重要,具有方志文化定位的意义。

方志文化虽然是其若干表征及其组织管理活动的总和,但重要载体却是地方志书(系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系指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文献)和相关地情文献及其文化延伸。其定性:本行政区域“历史与现状”(包括年度的)的资料性文献。这既是方志文化的属性,又是方志文化的特殊性,宛如机之双翼、车之两轮,具有“古”、“今”广阔的包容性与“继承”、“发扬”的连续性,从而传达出“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的信息,产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价值。

方志文化系中国模式(年鉴虽系舶来品,但其风貌已成为中国式的),属于中华文化范畴,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是地方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地方区域历史记忆和资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资源,有着与其他文献不可比拟和替代的独特性,属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范畴。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兴国的战略,为贯彻此决定,若干省结合实际亦作出相应举措,如11月9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决定》。随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分别从立法、贯彻、献策职能角度作出积极反映,形成系统规模与齐抓共管的格局。这对于中华文化建设、区域文化建设,包括方志文化这一中国模式的建设,即“历史”与“现状”资料文献的双重记述及其研发利用,是难得和难得的机遇。

鉴于上述机遇,方志文化的建设需要方志工作者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担当,放胆登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乘势而上,将之置之于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去思考,与我们这个文化时代和中华文化复兴时代齐步前进。

一、时代要求

一方面，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而言，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曾提出“科技兴国”、“人才兴国”、“教育兴国”、“工业兴国”等一系列兴国战略，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兴国的春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构成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文化兴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当今时代，文化发展和繁荣呈现出万千气象，即“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为此，“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而这一过程具体内容的记述，是方志文化功能与价值的体现。如何为这个时代服务？我们尤其应当把握方志文献“历史与现状”的关系，注重和强调特色志文化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包括风俗名胜名产志和大事记以及相关的地方资料，以努力放大方志文化话语权功效。

二、表现要求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文献保留革新（“历史记录”成果）和文献记述革新（“现状”记录）已成为我们构建方志文化表现的规定性要求。一方面，文献保留（“历史记录”成果）——传承区域历史记忆的数字化，堪称方志文化表现的革命，提升并扩大了方志使用和传播功效，特别是《中国数字方志库》的建设和逐步推广运用。该库先期收录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类文献万余种，涵盖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稿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活字本，堪称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以三级目录全文检索为主要检索方式的地方志专业数据库，具有数量多、版本全、品质优（书籍品相好）、“原书原貌”（高分辨率整版扫描）、检索方便等特点。另一方面，文献记述（“现状”记录）的数字化（科技化），具有表现的“多、快、好、省”，体现出时代发展的高科技思维和行为方式。

三、传播要求

传播既是方志文化意义的诉求（读志的教化需要），又是方志社会意义的诉求（用志的资治需要）。

志书是一方之全史，亦是方志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更是读书的选择与传播的客体之一。关于读书，古今中外格言警句虽不乏精彩纷呈，但最让人感慨的是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月27日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的一番表述：“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修养。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读书如此（从概念而言，志书也是书的一种），读志又何尝不是如此！读志是用志的基础，用志是读志的延伸和升华，二者是统一体。

除强调传播形式的多元性，还应强调其具有的普遍意义。无疑，扩大交流是方志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海内外既有相似或相同的方志机构，又存有相当数量的方志成果。扩大交流中，除欧亚有关国家之外，应特别注重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其理由：谈历史，两岸根连根；地方志是一方全史，乃地方百科全书；中华民族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代代赓续；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根性”文化的表征；两岸均有修志机构并有大量的修志成果与经验；台湾修志颇具普及性，层层修志直至乡村。交流内容：学术研究的、影视的、展览的（图片或地情书刊）、出版发行的，等等。近年来，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四川、广东、天津、浙江等地方志机构或地方志工作者与台湾修志机构或高校有互动，逐步形成两岸方志文化交融与互补格局。为此，笔者曾在2011年5月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建议：两岸文化交流应关注地方志交流，两岸文化论坛应关注地方志文化。

方志馆(包括数字化方志馆)的建设在方志文化的建设和传播中，具有重要的讨论意义。理由是：一方面，方志馆是区域文

化重要标志之一，是方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有效途径，亦是方志资源整合展示的平台，更是政府主导下亟需加强和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有国家、省、市、县级四个层面，涉及到其组织管理、编制机构、建设规模、设计定位（创意）、馆建风貌（特色，绝不可以千人一面）、展览格局、陈展内容等。其讨论结果，有利于拓展思路，事半功倍地指导方志馆建设，最大限度地放大方志馆的文化和社会功效。

价值是传播本质的重要属性。从此意义而言，方志馆建设应遵循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具体部署（这三大体系，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条例》所规定的，应当作为方志文化的一部分特别强调和遵循），立足于多功能服务和社会服务，凸现方志文化特征，体现方志文化横陈百科，尤其是在地情、人文资源的深度与广度开发上。

自社会主义新编方志以来，方志成果累累，可达数十万个（仅四川就有万余个），对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其中，特色志占相当比例，逐渐形成被社会所关注、所利用、所开发、所整合的重要文化资源。

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并可持续的发展，第二轮修志认识的与时俱进，若干省级地方志机构在规划、组织、编纂省级部门志的同时，加大了特色志的设立和编纂。这无疑是修志创新的有益探索。据不完全统计，仅四川省、市、县级地方志机构规划、组织、编纂的特色志可圈可点的就有：《峨眉山志》《都江堰志》《三星堆图志》《青城山志》《九寨沟志》《黄龙志》《川酒志》《川茶志》《川剧志》《五粮液志》《剑南春图志》《德阳三农图志》《筠连县非公有制经济志》《通江银耳志》等数十种（尚未包括基层地方政府组织编纂的如《李庄镇志》等志）。如加上其他地方编纂的如《泰山志》《五台山志》《黄山志》《孔子故里志》《颜真卿志》《客家志》《土楼志》《闵茶志》《名人志》《茂陵志》《帆船志》《奥运志》《北京胡同志》《北京会馆志》《湖北土特产志》等，应达近千种之多（尚未包括旧志中的山水寺庙志和名产风物志）。这些特色志与纳入规划和未纳入规划的志书、年鉴、其他相关地方书等，林林总总，车装斗载，筑起了中国方志文化的长城，流淌出了中国方志文化的大江，构成了“三大体系”的具体传播内容，具有“广”和“博”的特点，更具有传播的特色和效果，颇利于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力和贡献、区域文化的整体形象和实力等，成为实施文化强国（区域）战略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这一部分”的认识和关注是不够的，若干方面是缺失和不相适应的，甚至有边缘化的倾向，即使在中央提出文化兴国、地方党委提出文化强省（市、县）战略的今天，即使在相关部门使尽解数具体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为此，建议地方党委和政府加大力度，配套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定》，以更好地发展繁荣“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志文化，整合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史与志是经纬关系，二者互补，相得益彰，构成完整的时空体系。史是以纵向的角度反映区域情况，即从远古、中古、近古直至现代；内容分正史与野史，表现可叙可论。志姓“方”，是以横向的角度介绍区域情况，包括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物产、气候等方面，内容客观真实，表现述而不论。

鉴于上述方志与史的比较，基于方志系地方百科全书，具有“一方之全史，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的广博属性及其概括性，对于与历史博物馆相对应的方志博物馆的建设，应纳入地方文化建设的达标，即像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一样。

至于方志馆的建设，应注重科学评估，强调其地方性与综合性，即集历史博物馆、文献馆、档案馆、图书馆、科技（教）馆、纪念馆、非遗馆等相关特点于一体，汇集典藏数字化与陈列展览文献史料（以志书、年鉴、地方资料为主体，有别公共图书馆）、学术研究（方志与地方文化的，包括口述史的组织）、公共阅览、史迹推广教育，如人物春秋馆，可借助《人物志》，建区域通史意义的人物雕塑专馆；地方风物名胜名产馆，可挖掘特色志中地方风物名胜名产内涵，建表现区域文化特色专馆；抗震救灾博物馆，可凭借《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专业志书，纪录区域一个重大史事的过程；区域自然博物馆，可借助区域的名山志、江河志等中的相关特色内容来展示，等等。至于其传播效果的事半功倍，应动静结合，注重创意设计，充分利用科技声、光、电的特别表现，包括模型、沙盘、多维、动漫等，让展示的客体“活”起来，让参与者心“动”起来，以此较好地普及地方文化，服务社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将用志的意识和自觉行为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使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得到更多的激活和更大的张扬。

四、参与要求

据《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地方志系“三套马车”，即包括地方志书（史书）、地方综合年鉴、相关地方文献，构成了典型的地方文化成果。

在实践中，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编纂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已日臻成熟，但对于相关地情文献编纂及其成果推动却缺乏理性和自觉性，更谈不上系统规划和经验总结，尽管诸如河南、江苏等省地方志机构有一定的举措，推出了一定数量的方志文化成果。其实，除年鉴和大事记一类资料的编纂之外，本轮志书出版后的“间歇期”相关地情文献的编纂就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因它涉及到机构稳定、人才培养、事业发展、区域文化繁荣等问题。实践告诉我们，相关地情文献往往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因此，注重相关地情文化研发，尤其是特色志内容的深度研发，即与其他文化格局表现内容的普遍联系和互动是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及文化担当，还利于拓展方志文化与大时代文化的参与性。

除方志机构对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之外，方志工作者的参与亦是需要大力倡导的。置身于大文化时代，方志工作者具有熟悉地情文献的优势，其本身就是地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推手，不乏品牌效应（20世纪80年代，若干方志工作者便是“地方通”），如国家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的发起，峨眉山、都江堰、九寨沟等名胜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或自然文化遗产的文本，多出自方志工作者手笔（例：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罗保平在北京旧城文化保护规划方面有相当影响力、安徽省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翟屯建在徽文化研究方面卓有影响、成都市崇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张伯龄在古镇文化研究方面不乏影响）。笔者作为方志工作者，就关于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建议，作为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成果之一在大会通报。该文本的纂写，便源于对地情文献的发掘，即对1944年出版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的研究和思考。